

明清以來的輿論社會 *

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wn to Modern Times

王汎森 (Wang Fan-sen) **

個人之所以關心「明清以來的輿論社會」這個議題，純粹是二、三十年前對明清時事小說跟時事劇的新聞傳播性感到興趣的延續。訊息傳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一個事件如果未經傳播可能只有「點」狀的影響，一經傳播，則擴充為「面」。因為傳播「量」(scale)的多少，也影響到事情的「性質」。在這次演講中，因時間有限，我只談論明清以來輿論社會的幾個問題。首先，明清時代在邸報等傳遞訊息的方式之外，另有一些並未被充分當作訊息傳播管道的，如時事小說、時事劇。

過去對於明清社會輿論的研究多以邸報、邸抄、小抄、小報、宮門抄、轅門抄等史料為基礎，很少注意到時事劇、時事小說，還有各種歌謠所產生的新聞傳播作用。在當時，它們的傳播效果恐怕不能輕估，但是一般都被當作文學材料處理，而少從傳播方面的角度加以評估。這些文獻的創作，有許多是還在進行中、或剛結束的事件，故具有「即時性」。因為對訊息傳播轉變的題材有興趣，因此開始關注明清時期媒體與輿論社會訊息傳播的轉變。我認為從晚明社會一直到康熙二十年左右，可算是個傳統的輿論社會，到了晚清因為新式報刊的引進變成新式的輿論社會。

要解釋輿論社會的出現，首先要談邸報的問題。明清討論消息的傳播，有邸報、小抄等等，包括書本、謠言、街談巷語、揭帖等。這些文獻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它們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呢？它們的發行量到底有多少呢？都是值得注意的。

邸報在明代最盛的時候最多就一萬份，而且是「政府公報」的形式，所以對很多社會新聞它是沒辦法收錄的。邸報的性質跟近代報紙是不一樣的，邸報、邸抄因為帶有「政府公報」的性質，故主要在仕宦或士人階層間流行，但可以其他傳播方式滲透到更下層社會，包括用口傳、演戲等等，使一般人也能看到，但是內容則侷限在政治新聞而非後來出現的社會新聞。

所謂的邸報主要根據尹韻公所說的「批章奏折傳下後，六科或通政司把這些章奏編纂或輯成朝報。在京的各衙門要知道朝報的內容，或者派自己衙門的書手來六科廊房抄傳，或者由六科派人分發」，其中「在京衙門」不只是各省，還包括其他中央機構。由於每天發下來的

* 本文是筆者在國家圖書館「操控媒體：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『假新聞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上的主題演講，感謝主辦單位將演講記錄整理成篇。由於是演講，所以只能粗枝大葉地談，材料及出處本應在成稿時一一查證、詳加補充，但因在文稿刊出之前，手上正好有未完的工作在趕，所以進一步的工作只好俟諸他日。在準備演講過程中，參閱了許多書，不及一一列出，其中包括，方漢奇主編，《中國新聞事業通史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2-1999）、李江杰，《明清時事劇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4）及許軍，《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5）等書。

**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。

公文很多，無法全抄，所以在京衙門，每每就各自相關部份去抄，所以內容也會有一些不同，內容的實用性也非常強。一層一層抄下來，像樹枝一樣散開。收藏邸報的人顯然很多，明末，顧炎武（1613-1682）的父親，雖然是地方上的小讀書人，但也收藏了幾十年的邸報。過去士人常把邸報當成書一樣在看、摘抄，所以許多重要的史書，像明末清初談遷（1594-1658）所撰的明朝編年體史書《國榷》，還有像張岱的《石匱書》，便多是以邸報為基礎寫成的。邸報是短暫性的文獻，即使在當時也無完整收藏，而且邸報是半官方性質的，所以政府對邸報有一定程度的管制，但控制是非常間接的，就是沒有經過批准，非正式的內容不可以抄錄。曾經發生過一個例子就是，邸報已經發表某一個官職由某人派任，但後來沒有正式批准，卻因邸報早已將消息散出，所以這個任命案居然弄得天下皆知。

邸報、邸抄之外還有小抄，小抄就是抄邸報的人另外私底下所寫的。小抄帶有比較強的社會新聞性質。而三者之外還有大量的揭帖，將一兩張紙反覆傳鈔、擴散後就可以讓一件事情喧騰多時。像大家所熟悉的，明朝大畫家董其昌（1555-1636）強占人家僕人的漂亮女兒，有人編了一部社會新聞時事劇《黑白傳》到處演出，於是時事報導。同時一張一張揭帖發到上海及很多地方，競相傳播「若要柴米強，先殺董其昌」，最後激起民怨，導致董家大宅數百間房舍一夕間被人們糾眾燒掉。

時事的流傳還可以有時事小說、時事劇這種形式，長短不拘，而且它會影響很多事情。明代有一部由世家子弟張積潤所作的傳奇戲劇叫《雙真記》，因為內容諷刺魏忠賢（1568-1627）的附庸朱雲萊，雖然朱雲萊曾撰文反駁，可是等到朱氏過世後，其後人想要把他送進鄉賢祠的時候，當地人就說不行，因為以前那部戲把他寫得太壞了。所以這些半真半假的時事劇或時事小說，對當時輿論有很立即的影響。像崇禎皇帝殺掉熊廷弼（1569-1626），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導火線，就是東北傳來了一部時事小說《遼東傳》，當時有人認為是熊廷弼為自己敗戰卸責而寫的，熹宗皇帝看了這部小說大怒，最後決定要把熊廷弼殺掉。這些戲曲、小說雖然未必有全部的根據，可是它對現實的情勢仍發揮極大影響

。又如清初江寧書商刊印時事小說《萬金記》諷刺官員收受賄賂，順治皇帝就是看了《萬金記》才引發了清初的第一場科場案。《萬金記》雖然是真假混雜的時事小說，但它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後果。時事劇、時事小說寫的事件大多是一、兩年內或是兩、三年內發生的（當然也有達十年的情形），都是很近的事情。所以我們在討論社會輿論的產生時，必須把它們列入考慮。

史書有時也受到時事劇或時事小說裡面未經查證的東西的影響，像李自成（1606-1645）旁邊有個李岩，1944年郭沫若（1892-1978）出版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裡面，大講李公子如何如何，中國大陸有很多學者，包括像樂星等人認為李岩無其人，李岩是《剿闖小史》裡的人物，後來竟被寫進歷史。李岩這個人是否存在，真假難辨。

有些時事小說像即時新聞般，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改修，如明末《剿闖小史》，它改寫過三次，每一次都跟著時事的變化而改變。從期待吳三桂（1608-1678）來救明朝，到最後認識到吳三桂投降的本質，完全就像今天的報紙一樣。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上演、刊行的速度很快，所以才會有明人鄭之文《白練裙》雜劇裡面上演名妓馬湘蘭的戲情，還請到當事人馬湘蘭來觀看。

在座的王鴻泰教授的博士論文「流動與互動：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」曾引明末清初姚廷遴（1628-1697）所撰《歷年記》。《歷年記》為姚氏自崇禎元年（1628）至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的個人日記，裡面講他們對北方情形的瞭解多是靠《剿闖小史》這本書來的。該書很快就寫成，並流傳到南方，讓那些南方世家大族得以瞭解北京的動態，曉得要如何因應。

前面說過這些時事劇、時事小說成書多在事件發生的那一兩年，或三、五年內，所以具有很強的報導性。而且因為事情發生不久，這些小說或劇作就出版或演出了，所以它在描寫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時，不能胡說八道，如果對生活細節的描述出入太大，當代讀者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我們如果要重構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史中的許多細節時，我個人認為也有賴這一類的文獻。如馮夢龍（1574-1646）寫的《王陽明靖亂錄》（又名《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》）這本書在晚明流傳非常廣，

這也是一本類似時事小說的書，仔細比對兩者當然有出入，但是主體還是根據錢德洪（1496-1574）編修的嘉靖版《王陽明年譜》改寫。兩者當然有出入。《王陽明靖亂錄》稍微神話點，但晚明人要瞭解王陽明（1472-1529）事跡，有許多是從這裡入手。我想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中的很多細節，其實就是當時生活的細節，而這些細節在以描述朝代興亡為主的正史中常常是不提的。

但當時除了學者所熟悉的邸報、邸抄等小報史料等之外，其實社會新聞已經形成，而且是非常及時、具渲染性的時事劇、時事小說。這種書當時約刊印幾十種，但存世的並不多。如明代名劇《鳴鳳記》，劇情描述文人反對權臣嚴嵩（1480-1567）、嚴世藩（1513-1565）父子的事蹟。在嚴嵩失勢、嚴世藩伏誅之後，這部具有高度寫實色彩的劇作，立刻被搬上戲台。上演的時候，有人邀請當地的縣令去看，縣令不敢去，邀他的人拿出邸抄跟他講嚴嵩父子已經垮台了，那個縣令才敢赴約，可見這齣時事劇是非常及時的。又如晚明崇禎十六年很有名的湖北麻城奴變，過去對於這個大事件只在地方志中有片段的記載，而《兩鬚眉》一劇則對其前因後果交代得相當詳細。但是《兩鬚眉》的重點仍在表揚黃禹金的忠義，所以麻城奴變的前因後果雖然寫清楚了，但我覺得對「奴變」這一件事本身寫得不夠。

最近出版的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曾提到清初有一本名為《人天樂》的戲劇，裡面有不少篇幅在討論李卓吾（1527-1602）、金聖嘆（1608-1661）的思想，像這類創作，其實一方面傳播新聞，一方面傳播思想，頗有意思。

綜合目前可見的幾十部時事劇或時事小說，以及我在明代一般記載中所爬梳到的小說、戲曲、揭帖、謠言等零零碎碎的材料。我得到一種觀察，即我們今天所重視的「知的權利」，只是這些文字所關心的一環。更重要的是以下的意義：首先是現實的作用，如在現實生活中歌頌一種人物典型、一種價值、一種道德訴求，或是揭人隱私以滿足政治權力、甚至是現實政治的鬥爭。動員門客、寫手，作各種報導性質的時事劇、時事小說「互打」的現象亦所在多有。

但是造作時事劇、時事小說之類的活動，還有更深的一層意涵，它們似乎常常是為了樹立或維持某種民眾

自己所認可的「道德標準」而作。它們多少帶有褒貶、批評、期待的意味。故它們在報導、揭露之外，同時還藉此維持一般人所認可的某種「標準」——人們所認可的標準、道義、人情義理、合理的利益等，而這些是當時官方或豪強所不顧的。有時他們也嘲弄政治權威、表達不平、憤怒，好像要藉此維繫他們所認為的公平、道理，有時是無權無勢力的人靠著一支筆來維持些什麼、對抗些什麼。寫作者往往有一種潛意識，認為自己是在書寫歷史。敘述那些史書或地方志還沒記載，而目前正在發展的時事。

有時似乎可以看出人們是藉著書寫以維護鄉里秩序，或是對沒有明文規定，或即使有明文規定，但是礙於現實無力維持的一些標準：如對老百姓的委屈、看不慣的時事，老牛吃嫩草、有權位的人強娶或玩弄下人女子進行報導、揭發，引起人們同仇敵愾，甚至同聲討伐。常見的結果是它們既維繫了人情義理或道德，卻同時也沖垮了秩序，他們攻擊貪官污吏，卻也同時瓦解了政治權威。在造作謠言、揭帖、小說、戲曲時，人們似乎在建立自己某種特殊的「管轄權」，這些「管轄權」的範圍與官方有所出入。他們似乎也在對社會國家事件建立某種詮釋的權力與方式，這些舉動，對道德與習俗，或各種權威起著微妙的形塑力量。當然被報導、被攻擊的官紳或豪勢之家也往往起而對抗，或試著找出作者，施壓告官，或者也造作故事，鼓動輿論加以對抗。

時事劇常常讓人覺得它們與史書所描寫的七八成相符，可它總有兩三成基於特定目的，或為把人描寫得更完善，或是為了打擊敵對的人等等，而使得內容部分出現扭曲。時事小說、時事劇可能因為太時事化了，隨著清初言論控制發展，康熙二十年以後，慢慢代之以描述才子佳人愛情的歷史劇。歷史劇往往在諷刺個別的事情，但是只有內行人看的出來。直到晚清同治以後，時事小說、時事劇才又發展起來。

二

以戲劇、小說傳播時事的傳統到近代也沒有消失。把正在發生的時事，在很短的時間內演為戲曲、寫成小說的情形非常多。在劉復（1891-1934）、李家瑞

(1895-1975)主編的《中國俗曲總目稿》中可以見到許多，但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學者，所以只能從「輿論」的角度略為一提。

辛亥革命以前，不少戲劇社已經將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宣傳融入劇情之中。辛亥革命之後，孫中山(1866-1925)與袁世凱(1859-1916)之間的故事多次被搬上舞臺，孫中山為劉成禺(1873-1952)《洪憲紀事詩》所寫序辭中說，當他聽到袁世凱編演辱罵他的《新安天會》戲曲時，亦不禁啞然。晚清有很多這種傳播時事的戲劇，他們的內容真假相互滲透，不能全信。很多時事劇都是以描寫戰爭、革命的英雄為題材，如談秋瑾(1875-1907)慷慨就義的時事劇至少有兩部，它們都是在秋瑾項上人頭被砍下來不久，就完成了創作。除了英雄，晚清時事小說也有很多是以新聞報導的形式來誹謗對手，如晚清黃世仲(1872-1912)的《大馬扁》就是講康有為(1858-1927)如何竊取廖平(1852-1932)的經學考證的著作等。

到了晚清，邸抄、邸報逐漸演變成了京報，新式報刊出現後，傳統的政治訊息傳播管道就慢慢沒落了。很多大官要員發表告示的時候，根本也不透過原來的管道，直接在《申報》上就發表了。周作人(1885-1967)在民初有一篇文章曾評論：小時候聽人家講，《申報》沒有登過的不算，要《申報》登過了才算數。所以《申報》已經跟朝廷的上諭地位差不多了，可見這個管道變得多元化了。

同治以後，新式報刊進來且印量又大，就已經進入班納迪克·安德森(Benedict Anderson, 1936-2015)所說的「印刷資本主義」(print-capitalism)，一印幾萬份，甚至更多，到處都可以看到同樣一份報紙，形成一種虛擬的，空洞的一體感。

新媒體輿論出現，社會精英產生的方式也不一樣了；以前的社會精英主要都還來自科考，像爬階梯一樣往上升，清季的社會精英則常常是從報刊上來。許多人可以由作為報刊的負責人，作為輿論的旗手，成為新的社會精英，葉聖陶(1894-1988)日記中便說：「今日之眾英雄，皆報紙之生產兒」，辛亥革命前後湖北報人朱峙三(1886-1967)的日記中就描寫了不少這類人物。

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媒體「訴求」的方向也發生改變。

以前的「訴求」是向官方，最好要上達天聽，要上萬言書。孫中山準備開始革命前，也要找李鴻章(1823-1901)上萬言書。以康有為上書為例，《南海康先生傳》中說：「是時絕無布衣諸生上書者」。康有為第一次上書，即未取得同鄉京官同意，故未能代遞。但在新式報刊發達之後，只要往報紙上一登，就等於上書了。從此之後，論政不必要再去給衙門遞一封信，投遞報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渠道。當時很多人在報刊上發表電報以表示對於時局的立場(「電報戰」)，譬如章太炎(1869-1936)，時人便說他的一封電報抵得上一萬個人的軍隊。不必像清朝道光年間的湯鵬(1801-1844)，到處拉人來看他論政的書——《浮邱子》。湯氏就是希望說服京官，考慮接受他的政見。新式報刊出現後，論政的形式全變了，變成是公共的。

另一方面，社會精英要說服的對象慢慢地轉向讀者、市場，由上而下的「縱向」關係轉變為「橫向」的。所形成的網絡是「非親緣性的」(impersonalize)，是由市場、讀者來形成的。當言論、輿論、新聞變成一個新的武器時，社會由縱向的「ladder of success」變成橫向的。言論有沒有價值，也不再總是由上官來決定，而是由市場、讀者，由訂戶來決定，這個情形一直到今天都還沒什麼改變。

晚清以後，輿論社會產生了一種我稱為的「夥伴效應」。南美洲 Jenaro Prieto Letelier(1889-1946)寫的《合夥人》(El Socio)，裡面講住在南美洲的某個人因為不為大家所重視，他就虛擬了一個合夥人，說自己在英國有一個合夥人，每天藉著假合夥人的名譽做各種事、發表各種意見，弄得風生水起。最後人家要求那個合夥人出現，他只好安排一場假的決鬥，把他的合夥人槍殺了，並對公眾說他把合夥人打死了，此後不再受這個合夥人糾纏。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人，是他為了提高身份、躲避事情責任等等所捏造的一個虛擬人物。而晚清新式報刊宣揚新輿論、新思想的時候，每個訂報紙的人就像看不見的匿名合夥人。很多跟你讀同一份《時務報》的人，很可能是跟你的看法相近的「合夥人」，而且決不決定要訂這份報，等於就是選擇要不要這個「合夥人」。這個「合夥人」常時來訪，所以它們等於是家庭或地方社會中有主體的實際參與者。匿名的「合夥人」可能形成

一股很大的力量，所以史量才（1880-1934）說蔣介石（1887-1975）有五十萬軍隊，我有五十萬讀者。

晚清以來的新報刊形成了某種獨立性，報紙雖然常受到官方或其他力量的干預，但如果報人扛得住，則官方的意志跟報刊言論之間不必有必然的關係，新報刊形成了一個「獨立領域」（independent sphere），這跟以前的邸報有所不同。雍正年間，有個小報報導雍正跟他兄弟在頤和園怎麼樣飲酒無度，雍正馬上把小報的兩個重要人抓來砍頭。新報刊大行以後，這些管道所造成的輿論「獨立領域」與官方意志慢慢脫離，而由讀者、市場跟這種橫向的社會來決定它的力度。

新「文人群體」的出現當然也與新報刊有關。既有發表園地，通常也有稿費可維持生活，新式文人固可以靠報刊舒展拳腳、維持生計，不少考不上科舉的舊時代文人，或者原來功名很低的舊文人，也可能轉變成報刊的作者。有一本書叫《稿酬怎樣攪動文壇：市場經濟與中國近現代文學》（魯湘元著），說有些名作家靠著在報紙上寫文章，月得三四百元。當時北京最有名的教授，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寅恪（1890-1969）先生，也從史語所和清華大學共得到四百元。

新報刊媒體的出現，使得輿論社會的主持人身份大變，「寒酸之人」可以藉著發表文章，對富有或有權力的人指指點點，如朱峙三在日記中說：「現又有人創設《國民日日報》……該報執事人等，多半寒微出身，甘於為非，擾害大局」。身分組成的變化也導致「舊輿論」與「新輿論」的更迭。甲午之前，「舊輿論」的中心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士大夫，他們的輿論特點是「以志節自負，廉介自許，對於中國傳統之政教根本、治術精華了解較深，思想教養，亦師法前哲，自有其風采境界，為士林所宗奉，在全國有極大之潛勢力」（石泉語）。甲午之後，中下層的不滿士人挾持著報刊的力量發表「新輿論」，取代了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士大夫所壟斷的「舊輿論」。

在新的輿論社會中，主編往往是關鍵人物，正如葉聖陶日記中所說：「（報紙）大抵各依其主見以為勝負」，主編比較關心銷量，注意讀者的意向，故往往需要就「下」，要能觸動一般百姓關心之點。而且每每由私下口頭談論到化為報紙文章，即成為「公論」，往往

幾篇讀者投書，就可以改變政府的一個政策。而且許多原來是官府之間私下溝通、商討的事，也會要刊登在報刊雜誌上讓讀者檢視。多元化當然是新輿論社會最大的特色，但我們也應注意到，同時也可能因為新報刊的廣大流通而消弭了地方上原本多元的、歧異的（尤其是保守派）的聲音。這種傾向，在語言、風俗等方面也表現得非常明顯。多元性、一致性這兩種傾向，一直是同時發展、競爭著的。

三

以上略述明清時期媒體與輿論社會訊息傳播媒體的轉變，另外得出幾點心得：

第一、訊息的傳播往往比我們想像的快。明代中期以後輿論的傳播，不管是透過哪一種方式：如透過謠言、透過流言、透過街談巷語、透過書本、揭帖、邸抄、小報等等，傳播的速度和幅度，都比想像的要快，而且影響範圍很大。我原來以為這類傳播不會太快，但是比如說清雍正年間發生的呂留良（1629-1683）案，案發沒多久，日本、朝鮮就都有消息流傳。我看了大量的朝鮮《燕行錄》和日本通信使的資料之後，比較敢確定這些訊息傳播的速度。像這一類的傳播，倘若拿幾個事件作為定點來研究，可以勾勒出它們的傳播速度與傳播幅度。

第二、訊息是人們賴以生存的重要東西，是人賴以瞭解社會狀況並作決定與行為的一種依據。訊息是需要被知道的，人們需要知道大家在做什麼，我應該做什麼，大家可能是怎麼反應這件事情。訊息、消息跟輿論也是調動與影響政府官員、社會行為的一個最重要元素。訊息對一個社會來講，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（Friedrich Hayek, 1889-1992）所談的「價格」（price）。他談到價格是調動市場的重要因素，使得大家都不需要依賴上面的規劃與指揮，就可以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易行為。

制衡、監督始終是輿論的重要作用。明代徐日久在其《真率先生學譜》中就說，要能不看邸抄，才能大膽辦事，可見制衡、監督、批評、揭露的作用始終是在的。但更重要的是訊息，包括謠言在內，是群眾賴以生存的

必要的東西。如明末北京已經失陷了，各地的官員與群眾要做什麼事情來因應？趕快躲起來或是計畫反擊？在生活中如果沒有各式各樣的消息，人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事情。晚明祁彪佳（1602-1645）《祁忠敏公日記》中有一段講，如果看不到邸抄，一切只能向壁虛造。這也反映出很多人、特別是政府官員辦事情的時候，不論是真的訊息、假的訊息，這些訊息使他在連結社群與對國家政治的想像時能夠有個依據。如果只靠幾件公文來來去去，顯然是不夠的。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訊息，當它流動之後，人的行為、對事情的感知、判斷等都會跟著變化。

第三、訊息所扮演的社會功能很廣，甚至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階層與地位，譬如在過去，能看邸抄的是一個特定的階層。一般人如果真要瞭解新聞，就得聽人家講，看告示，或是透過看戲之類的方式，這裡面區分出了社會階層的高低。在報刊時代，可能因為是在共同的訊息系統下，而形成一種同志感。同時，是否有能力買報，是不是有能力讀報？所讀的是新派或舊派的報刊，其實也在地方上或羣體內塑造出一定的高低身分之影響。

最後，我想引一段話，胡適（1891-1962）在新文化運動之後，曾寫了一段話：「突然間，在地方出現大量的刊物，它們形成地方教育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。小

小的地方社會中，向來都是仰賴大都市提供知識的，它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輿論社會。」胡適很敏銳地觀察到新文化運動前後，小小的地方社會也成為一個輿論社會，也發行自己的報刊。明年是五四運動百年，我們可以從五四時期的各種刊物看出一個等級關係，在北京老師一輩辦《新青年》，學生一輩辦《新潮》，然後就一級一級下來，湖南的毛澤東（1893-1976）就辦《湘江評論》，還有難以數計的地方小刊物。《新潮》的很多想法、觀念就沿襲他們老師的《新青年》，地方上的刊物則每每承襲北京的《新青年》或《新潮》。有許多小地方的青年辦報刊，形成自己的輿論社會，這是前所未見的，這個新報刊現象掀起了一個巨大的革命。

新文化運動之後，孫中山感受到媒體的力量，所以他 1920 年〈在上海中國國民黨部的演說〉裡面講，要計畫設立英文雜誌及印刷機關，要成立刊物宣傳，因為他發現宣傳、思想、青年三位一體的力量。在此之前，孫中山老想要結合各種政客、建立軍隊，五四之後他發現藉新式報刊傳達思想的力量，靠著一群學生，就足以把北方的政客弄得灰頭土臉。後來國民黨有幾個重要刊物及出版單位都是在那之後才建立的。

以上是我對明清到近代的輿論社會的幾個問題的一些初步看法，其中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，敬請各位指教。